

張玉法院士訪談

訪談資訊

時間：2013.8.22（四） 上午 10:00-12:00

地點：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 張玉法院士研究室

訪問者：吳佩樺 陳逸雯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）

文稿整理：吳佩樺

前言

張玉法院士（1935-）為臺灣師範大學史地系四十八級校友，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、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，現為中研院院士。張院士早年曾治古代史，後主要研究中國近現代史，著有《清季的立憲團體》、《清季的革命團體》、《民國初年的政黨》等書。現正撰寫《中華通史》，研究不輟，為海內外知名的歷史學者。

這次很榮幸能聆聽張院士從學生時代到從事研究工作的心路歷程、對史學的種種省思，以及給後輩學者的勉勵。訪談中，張院士對學術的執著和對人生的瀟灑心境交相輝映，不僅令人深受感動，更讓我們重新思索：在這個喧囂的年代，如何期許自我成為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。

壹、緣起：學生時代

背景：大學校系的考量

我讀的中學是臺灣省立員林實驗中學。這個中學是怎麼來的呢？民國三十八年，政府從大陸撤退來臺，我是隨着我所就讀的中學來臺的。我祖籍是山東省，山東省有一批中等學校流亡學生到臺灣來，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，到臺灣之後，高中生差不多都當兵去了，政府叫他們當兵。我那時候才初中一年級，政府繼續讓我們讀書。我們最初是在澎湖馬公讀書，民國四十二年學校遷到彰化員林，只有那麼一個山東省來的學校，原本叫「教育部特設員林實驗中學」。那時候教育部沒有錢，養我們一個中學很不容易，後來就把我們改為省立，叫做「臺灣省立員林實驗中學」。

高中畢業的時候，要考什麼系，實際上沒什麼概念。當時我對歷史比較有興趣，我是一個人到臺灣來，生活無着著落，師大有公費，就決定考師大史地系。

當年史地系課程複雜，導生關係密切

那時候史地系的課是非常複雜的。史地系分兩組：地理是一組，歷史是一組。但是歷史組的人要修一些地理課程，地理組的人要修一些歷史課程。現在很多課是選修的，那時候很多共同課都是必修的，如大一國文、大一英文、國音、哲學概論、三民主義；師大還要修教育學分，如教育學、教育心理學、教學實習等。課程非常多，每一學期都要修二十多個學分。

我印象比較深的老師，中國史方面，上古史有朱雲影老師，朱老師比較親切，老師對學生親切，學生就比較喜歡跟他親近，我們常到他住的地方去看他。另外教中古史的李樹桐老師、教近代史郭廷以老師等，給我的印象也很深刻，因為李老師對李世民殺兄奪位很有研究，郭老師對學生很嚴格。那時候我對近代史還沒有什麼興趣，對古代史比較有興趣，所以跟朱老師的來往比較多一點。西洋史方面，有兩位老師對我影響最大，一位是張貴永老師，張老師上課不用講義，知道得很多，講西洋近代史如數家珍。另外一位是曾祥和老師。曾老師開「西洋名史選讀」和「西洋上古史」，講話風趣。那時候每班有一個導師，曾老師是我們的導師，拿到小小一點導師費，還請我們去碧潭划船。我選上院士的時候，能聯絡到的老師只有曾老師，我約了幾位同學陪我一起去謝師。

時間管理重要，閒暇加強自修

讀師大的時候，雖然課很多，應付功課不是很困難。那時候老師跟現在不一樣，很少老師開參考書叫你看，因為沒有什麼書。老師講課時，就抄筆記，把筆記背下來就可以考試了。有很多同學寫字比較慢，記不下來，還借我的筆記去抄，有時借來借去不見了。筆記不見，是被不願轉抄的同學拿去看了，考完試就回來了。反正我覺得應付功課還好，三分之一的時間就夠了，其他時間可以自己來用。師大公費只發伙食費，在臺灣沒有家庭的同學可以申請免費住宿舍，但生活零用、買書、朋友往來，還是需要錢，所以晚上有時候去做家教，有時候去為外校的教授搜集資料，賺點外快。白天除了修課，就是到圖書館。我什麼都書都看，哲學的，科學的，文學的；我對文學還有點興趣，常常投稿。當然，還是二十五史、通鑑方面的書看得比較多。

大學最重要的是學到如何「做學問」

大學對我最大的影響是知道什麼樣是「做學問」。當時我幫國防研究院的一位教授做助理，他參與編修《中國歷代戰爭史》，經朋友介紹，他叫我做助理。他給我一個題目，我給他寫個草稿，他再來改。史地系的老师中，我剛才提到李樹桐老師，他寫過一篇有關玄武門之變的文章，根據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否定一些新舊唐書的說法。他告訴我們，很多歷史問題需要不同材料去做不同的研究。以前覺得歷史就是這樣，大家寫的都一樣，實際上現在所了解的歷史知識也不過是目前的人所了解的，也許以後會有新的研究發現，也許事實不是這樣的。

中學講課千篇一律，萌生繼續進修想法

那個時候師大規定畢業之後一定要分發服務，去中學教書。去那裡教書，依你的畢業成績來填志願。大家都喜歡留在臺北，留在北部，我那時候成績還可以，想留在臺北，但沒有留成，後來就到了基隆。在基隆中學實習一年，又去當了一年預備軍官，回來再去基隆中學教書，教了三年。

後來發現教書有一點無聊。教中學都是一個進度，像我教歷史，或教地理，一教就是九個班。每週十八節課，九個班都是一樣的。在這個班講這一套，到那個班還是講這一套，所以覺得滿無聊的，後來就想回學校去進修。

那時候歷史研究所只有臺大一個，其他的學校都沒有。臺大比較喜歡收臺大畢業生，其他學校的學生很難考進去，所以就考政大新聞所。我考新聞所，跟中學一段經歷有關，我在中學時編校刊，就是學校的校刊，跟報紙、雜誌的工作差不多，所以就想到去考新聞所。

研究所時期興趣仍在古代史

那個時候的近代史，不只我個人，整個史學界，包括老師、同學，都不大敢碰。不敢碰的原因是：第一個，當時是戒嚴時期，禁忌很多。早期的戒嚴比後來厲害多了，國民黨不能隨便寫，孫中山、蔣中正更不能隨便寫，動不動就說你思想有問題。第二個就是那時候資料沒開放，近代史資料都看不到，不管國民黨黨史會的檔案，還是國史館的檔案，幾乎都不開放，所以沒辦法做研究。我在政大新聞研究所的時候，論文寫的還是古代史（〈先秦時代的傳播活動及其對文化與政治的影響〉）。

貳、追尋：初入學界

因緣際會進入近史所

政大新聞研究所畢業之後，就不想再回中學教書。那個時候跟現在不一樣，研究所很少，拿個碩士就不得了了，就不想教中學了。本想進報館，曾去考《中央日報》記者，但報名表要填黨證號碼，我沒有。後來沒辦法了，我就去找朱雲影老師，朱雲影老師說：「你可以去找郭廷以老師。」郭廷以老師那時候正在籌備近代史研究所，他是籌備主任。

郭先生非常嚴肅，他跟同學不太往來，大家都怕他。他上課的時候前三排是沒有同學的。我就跟朱老師說：「郭老師？我跟他沒什麼往來啊！」

他說：「我也與他很少往來，但他不講什麼人情的，你把政大寫的碩士論文拿給他看。」

我說：「我寫古代史啊！」朱老師說：「古代史沒有關係，他看到你程度好，就會用你。」

因為沒有別的地方好去，有一天就硬著頭皮給郭先生打電話。

我說：「我有一篇論文想請老師指教。」郭先生說：「什麼論文？」

我告訴他，他說：「好吧！你拿來吧！」那時候他住在和平東路的教職員宿舍裡，他住的房子有一個竹籬笆，大門開在靠近巷道的竹籬笆中間，有一個破舊的木門。有一天我到了郭先生門口按門鈴，郭先生出來了，我把論文拿給他，他都沒讓我進門。

他說：「回去吧！我看看論文再說。」大概一個多禮拜，他找人通知我到近史所談一談。我到近史所看到他，談了幾分鐘，他說：「明天就來上班！」

近史所肇建，為臺灣推進學術交流

那個時候臺灣很窮，我們的政府不是接受美援嗎？我們近史所也接受美援。最初臺灣沒什麼近代史研究，為什麼沒有？就是因為剛才提過的：禁忌太多，史料不開放。那為什麼要特別設一個所來研究近代史？因為那時候美國史學界熱衷於研究近代史，為什麼熱衷？因為中國出現一個毛澤東！中國突然之間變成世界的威脅了。原來中國很弱，帝國主義都來壓迫中國，毛澤東起來把所有帝國主義國家都趕跑了，而且還要跟著蘇聯搞世界革命，後來打韓戰、打越戰，弄得整個亞洲不安，所以大家都要來研究，這個中國到底是怎麼樣起來的。外國學者對近代史非常有興趣，但是我們臺灣沒有人可以跟他們對話，因此就成立近代史研究所。成立近代史研究所，史語所有人反對，說：「歷史還有什麼近代史、古代史？所有歷史史語所都可以研究；你們要研究近代史到史語所來就可以了，為什麼要成立近代史研究所呢？」反對的人不知道，近代史研究所是在美國史學界支持下成立的，它的特殊任務就是專門推動近代史研究，並跟外國學者做學術交流。

學徒「基本功」奠定往後研究基礎

我進入近代史研究所以後，最初沒有正式做研究工作，主要是當學徒吧！當時近代史研究所的主要歷史材料是自外交部接收到的一批檔案，最有名的是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」檔案。總理衙門是 1860 年成立的中國第一個外交機構，也是一個洋務機構，很多老同仁都在整理這些外交檔案。

郭先生約我來近史所面談的時候，也約了我的一個中學同學來，他是臺大畢業的陶英惠先生。郭先生為什麼約他來呢？因為在雜誌上看到一篇文章，陶先生寫的，討論太平天國的事情，他看了很欣賞，就叫這位年輕人來。我們兩個先後到了郭先生的辦公室，碰面時出乎意料：「你怎麼也來了！」與郭先生談話之後，我們兩個就一起進入近史所工作。

那時候剛進來的人，基本上做幾種工作：第一個是編檔案，我也編過檔案，工作是標點檔案，因為以前的檔案都沒有標點符號。第二個就是做口述歷史，現在做的人很多了。我做的第三個工作是調查史料，曾經到國民黨的黨史會資料庫，那時候在南投草屯，我在那裡住過半年。我對近代史資料了解比較多，開始時得力於我在草屯的半年。我還負責過在報紙上搜集近代史資料。近代史跟報紙有關係，報紙上有很多史料，有的是報紙刊佈的史料，有的是當代重要大事。郭

先生說：「你看哪些有史料價值，就把它選出來，用紅筆勾出來，找工友剪下來貼到一張紙上，你再把它分類，分成政治、經濟、外交、學術之類，然後把它裝起來。」那時分類剪貼的報紙資料，現在都不曉得丟到哪裡去了。

為了採集史料，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做，我還到臺灣各大圖書館去抄圖書卡片，看看這個圖書館有些什麼近代史的書。我覺得這訓練很好，透過這些基本訓練了解了很多東西。

差不多經過兩年，郭先生就說：「現在可以做研究了，你可以找一個題目做研究。你的學長們（因為那時候來近史所的，師大畢業的比較多）都編清朝檔案，你就做二十世紀史的研究吧！」

參、對話：赴美進修

美援資助，哥大留學

美國學術界聽說臺灣要成立近代史研究所很興奮，他們願意資助這個所的發展。美國有一個福特基金會（Ford Foundation）先後資助我們十五萬美金，十五萬美金那時候太大了！這十五萬美金幹什麼呢？第一個就是買史料或編史料，第二個就是要所裡的研究人員出國進修。因為臺灣那時候的教育不是很發達，到研究院來的幾乎都是大學畢業生。近史所的第一個碩士是自美國回來的碩士王萍女士，她是研究明清之際天文曆算的。郭先生拿她當寶貝，只要有外國學者來，一定會把王萍小姐叫來，介紹給這些外國學者：「她是威斯康辛（University of Wisconsin）大學的碩士！」

在外國學者看來，近史所的研究人員一定要進一步訓練，一定要讓他們出國進修，或者是讓他們出國去看一些國外的材料。因為福特計劃有這麼一部分經費送同仁出國進修，我就是在這個計劃之下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（Columbia University）進修。那時我還年輕，年輕人要讀學位，就給你一年零九個月的公費，一個月是三百塊美金。三百塊很多了，三百塊換算臺幣是一萬二千塊（我當時的薪水是一千二百塊），一百塊是四千塊。就在那個計劃之下，而且只有一年多的時間，在哥倫比亞讀一個碩士就回來了，必須回來，沒有錢了。

在我看來，美國的碩士沒有早期臺灣的碩士程度那麼好，因為美國培養人才的重點是博士，碩士只是一個過程，基本上只要用功一點，大概一年就可以完成。我的課修了一年沒有修完，因為前半年英文不好，還要花一些時間學英文，英文學了半年，考試通過了才能選課。所以我頭半年幾乎沒有選什麼課，到第二學年選課的時候，要交學費，學校說：「第二年不要交學費了！你是一年級的學生，第一年沒修完就第二年繼續修，不要再交學費。」

中西教學差異？國家大事件 VS. 鄉村小案件

在美國最大的發現是，我們西洋史的程度太差，他們中國史的程度太差。教

中國史的老師們都將就美國學生，教得非常淺，雖然是研究所的課，我們聽起來都是一般性的。那個時候我雖然對近代史還沒有太多了解，也覺得老師所教的沒什麼特別的。但當我修西洋史的時候，就覺得在國內學的西洋史太簡單了。

我出國的時候已經寫了一本書稿，叫《清季的立憲團體》，既然研究憲政運動，英國是憲政最早的國家，我就選了一個「英國憲政史」。完全出乎意料，老師講的完全不是我所想像的憲政史，幾乎都是講鄉村、小城市裡面一些法制問題，非常細。所以我寫的研究報告，雖然參考了很多書，在老師看來題目都太大。美國學生所寫的都是些鄉村發生的小案件，我卻寫一個國家的大案件，老師覺得這不像一個研究報告。美國史我也修過。美國的歷史雖短，但寫得非常細，每個州都寫得很細，我怎麼會了解那麼多？在美國這段時間，最大的影響是了解到世界的史學行情，覺得自己要有一個選擇。

回歸歷史本行，不做社會科學的註腳

西方的歷史學者有兩派，一派跟中國差不多，就是找歷史材料寫歷史故事，他們叫「敘述的歷史」(Narrative history)，只要你的史料能證明你要論述的問題，把歷史的事實敘述清楚就可以了。另外一派就是社會科學派，一定要找一些理論，把歷史的事情給它一個模子，它是一個什麼 pattern，就套不同的理論進去。或在論述歷史的時候，注重分析，不注重史事。這一類的歷史，叫「分析的歷史」(Analytical history)。我的老師韋慕庭先生 (Clarence Martin Wilbur) 反對這一套，認為歷史是把一件事情講清楚就可以了，把資料找夠就可以了。

一般年輕人都喜歡社會科學的東西，社會科學的東西在我看來比較容易引起人家的興趣，但也比較不容易像司馬遷的《史記》那樣，成為永垂不朽的歷史著作。許多社會科學的史學著作，風行幾年就沒有了。中國傳統史學注重基本史實的重建，許多著作，過幾千年也沒辦法否定它們的存在。有些社會科學的歷史著作有一個問題：專找有利的證據，對他沒有利的證據就不要了，所以看到的東西只是一個面。我是主張把各派的資料都拿來看，最後做一個判斷。我也受到社會科學的影響，從美國回來之後介紹了一些新觀念給國內的學者，提倡把統計學和心理學的方法，用在歷史的研究上。電腦的發明，使大量史料的統計分析不需完全靠人工，促使統計方法的普遍使用；弗洛伊德 (Sigmund Freud, 1856-1939, 奧地利人，居於英國) 的潛意識理論，促使心理學方法的普遍使用。這些當時在美國是很流行的。心理學方法有些年是滿流行的，現在風氣都過去了；統計學的方法還在應用。我覺得歷史還是回到歷史本行，不為社會科學家的論述作註腳。近史所以前推動過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，常常找一些社會科學家來講演，經濟所的副所長劉先生說：「我們合作來研究經濟史，你們幫我找材料，我來寫。設法把經濟是成長還是衰退找出來，其他的資料就不要了。」我就反駁他，我說：「歷史是一門獨立的學科，不是你們的附庸吧？不管成長、衰退，發展經濟的過程本身就是歷史。」歷史學可以借用社會科學的方法，參考社會科學的理論，基本上跟社會科學不一樣。

史學方法受科學的影響很深，胡適提到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」，就是科學的方法。歷史學在方法上是要科學的，但是未必要去套什麼理論，只要被一個理論套住了，就走不出來了。最吃虧的是中國大陸學者搞唯物史觀，他們寫了幾十年的書，現在很少有人看了。

肆、典範：研究之道

突破時代限制，研究晚清立憲

我最初的構想是要研究政黨史，從民國初年研究起。因為我從小就經歷國共兩黨鬥爭，後來被共產黨逼到臺灣來；想研究政黨史，了解底蘊。研究民國初年的政黨時，發現很多政黨都是從晚清革命、改革這兩派演變來的，所以必須要追溯這個源流。第一個先追溯立憲派，就是梁啟超這一派。那時候近史所的張朋園先生在研究梁啟超，後來他又研究立憲派，都是以人物為中心。在他研究立憲派的時候，我就研究立憲團體，因為政黨是從團體開始的，所以我就從立憲團體的角度去研究。我們研究立憲派、立憲團體還有一個考慮，以為國民黨的干涉會比較少一點，後來發現不是這樣，國民黨有關人士很關心我們怎麼樣寫立憲派，因為立憲派一向跟革命派對抗。

張朋園先生研究梁啟超期間，成功大學歷史系請他去講演，他要講梁啟超，系主任一看到海報，就說這不可以講，趕緊把海報撕下來，他說：「梁啟超是國父的敵人啊！怎麼可以公開來宣揚梁啟超！」你看，那個時代就是這樣。我和張朋園先生研究立憲派，國民黨黨史會裡有的先生們就說，他們是革命派，我們研究院的人是立憲派；他們對我們研究立憲派很有意見。

我到美國進修之前，把《清季的立憲團體》稿子寫了出來。早期同仁的稿子都是郭先生自己看、自己改。後來人多了，他就沒有時間看，我的稿子他找了朋友看，朋友說寫得很好，可以出版。但我還是沒什麼信心，既然有機會到美國去，我就想到美國再找一些材料，再改一下。所以那本書等我從美國回來才出版，出版這個書本身沒有受過什麼挫折。

寫完立憲派就寫革命派，寫革命派對我來說比較容易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在草屯國民黨黨史庫待過半年，抄了不少資料。國民黨黨史庫的資料雖然比較敏感，不輕易讓人看，更不能隨便抄，但是像辛亥革命這一段，基本上他們比較放心，沒有什麼大的禁忌，所以我抄了很多資料，而且我在留學美國期間，也搜集了一些資料，基本上材料幾乎都搜集好了，寫革命團體的時候就比較順。

但是寫好之後，所長王聿均先生看了之後不敢出版，他說：「有些地方你說得太直了吧？」我說：「太直了？冒犯了什麼？」

他說：「你說孫中山先生網羅了一些流氓去革命啊！這個對孫先生不好。」我說我是根據國民黨黨史庫的材料。他把我的書稿壓了半年，後來也出版了。後來政治漸開放，所裡的經費漸充裕，研究工作愈來愈能開展，就不多說了。

研究熱忱不減，退休時間不夠

做研究是這樣的：你必須執著這個工作。我覺得做研究本身是一件非常值得投入的事情，但是對某些人來說，把他關到一個研究室裡面，面對的就是書或檔案，會覺得很無聊吧！所以就要看你有沒有這種興趣，或者你的性格是不是適合做。假如覺得這些事情很無聊，你最好不要走研究的路，勉強的話也做不好。實際上進入研究院做研究的人，不一定每個人都能做出研究成績來，可能跟自己的興趣有關，或者是投入的時間不夠。所以必須要看自己的個性，考量自己是否可以投入這個工作。

我有很多朋友退休了，有人是在研究院退休的，有人是公務人員、中學教員或大學教授退休。退休以後要幹什麼？我有一個朋友說，可以睡到自然醒，但醒來不知何處去。假如你對研究有興趣，就不會有這個煩惱，甚至覺得時間不夠用。

一諾千金，執筆通史

我退休之後，有一個稿債還沒還清楚。我曾經答應東華書局寫一部《中國通史》，作為大學用書，我曾為東華寫過幾本現代史、近代史的書，因為銷路不錯，東華老闆卓先生說：「你再給我寫一部《中國通史》好了！」我當時不敢答應他，我說：「我這幾十年研究的只是近現代史，你叫我寫近現代史還好，叫我寫中國上下五千年？這得下十年功夫。」我不敢答應他。卓老闆請我吃好多次飯，也送了好多禮來，我都不敢答應他。有一天他又請我吃飯，拿一份合約來，說：「張教授，請你給我簽個字好嗎？我已經求你那麼多次了！」我說：「卓先生，我真的沒有時間幫你寫，我現在也沒有這個能力。」

他說：「你看，我都沒有寫交稿日期，你什麼時候寫好就什麼時候給我。」卓先生這麼有誠意，我實在覺得不好拒絕他，我還跟他開玩笑：「簽字可以啊！但恐怕要到退休以後再寫了！」他說：「沒關係，你有時間再寫。」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我簽了字，但簽字之後就一直沒有時間寫。

退退休之後，就想開始寫。我以前在師大、政大、臺大兼過課，後來因為事情多，就不兼了，差不多有十年沒兼課。等我退休了，政大文學院長和歷史研究所長來找我，說：「你現在退休了，沒有事了，可以來幫我們上課嗎？」政大要聘講座教授，校長也跑來了。政大是我的母校，負責行政的人這麼有誠意，我答應教三年課。這三年課因為是講座，不能拿以前的老講義去講，要重新準備講義，結果三年又沒有辦法寫《中國通史》。

就在我做講座教授的最後一年，就是第三年，我突然在報紙上看到東華的老闆卓先生在上海過世了。我覺得非常慚愧，答應他的事情沒有能夠在他生前完成。我就決心什麼事都不做，任何人找我做什麼都不做，把《中國通史》寫出來。我打電話給東華，我說：「卓先生過世了，我還欠他一本書，你們還要不要？」卓老闆的太太一聽到這件事就馬上請我吃飯，知道她先生還有這麼一個遺願。她

說：「張教授，你一定要幫他把這本書寫出來！我們全力支持你，一定把它寫出來！」既然這麼願意支持，我就想到中華民國在臺灣六十年，還沒有一套比較大的《中國通史》。中國大陸出版的大套《中國通史》，大概可以擺滿一整排書架；是用馬克思的歷史五階段來架構中國通史。我對卓太太說：「假如你們要我寫的話，我準備把這本書寫長一點，可以寫個五卷本，分段把這個通史寫出來。卓太太非常熱心，她說：「沒問題！我們全力支持你。」所以我就開始寫，把所有其他的工作都推掉了。因為現在很多人對「中國」的概念不清楚，就把這部書定名為《中華通史》，已出版到第二本。第一本從遠古寫到東漢，第二本寫三國兩晉南北朝，現在第三本隋唐五代也快出版了。第一本六百多頁，第二本七百多頁，第三本比較長，大概有一千頁，現在開始寫第四本。

我希望能夠利用退休的年月，把這套書寫出來。因為是一個人寫通史，沒有那麼多的精力，中國大陸學者寫大部頭的通史，都是很多人一起寫，我是完全一個人寫，連助理都沒有。基本上是用《資治通鑑》、《續資治通鑑》一類的材料，再參考《廿五史》裡面的材料，以建構基本史實為主。

史學風潮轉變？「大歷史」對話困難

我這裡有一套《中華民國建國史》，是怎麼修起來的呢？大概在七〇年代初，那時候兩岸還沒有學術交流，突然之間大陸傳出來消息，說他們要修中華民國史。這邊國民黨當局很緊張，教育部也緊張，說：「我們中華民國還沒有亡，為什麼要修史！」政府有關方面一直有一個禁忌，就是國家還沒有亡，歷史不能修，一定要國家亡了之後才可以修，這是很荒唐的說法。史學界向有關方面上建議，說：「中華民國史由我們自己來修！」國民黨黨史會和教育部就緊急召集我們一些學術界的人，說要在大陸修好之前，我們要先修出來，但我們不能叫「中華民國史」，我們叫「中華民國建國史」，因為還在建國當中，所以修了這一套。現在想修中華民國史就很困難了，因為現在年輕一輩的學者，都是做非常小的題目，而且大都不做政治史、經濟史，都做文化、生活方面的一些小事情，有許多學者只做臺灣史所，叫他們寫中華民國史，他們不一定有興趣。

我也問過一些年輕同仁：「你們為什麼不做大的題目？」他們半開玩笑地說說：「大的題目統統被你們寫完了！」實際上，我覺得可能是史學的學風改變了，大家對於政治上的事情沒有興趣，比較注重生活上的瑣事，對於什麼國家、民族，不太關心。這種風氣，當然是受到西方史學的影響。我們算是後現代化國家，後現代化國家的人比較喜歡搶鋒頭，一看到外國有人走到一個新方向去，就趕緊跟著人家走；實際上，絕大多數的西方歷史學者還是做大題目的。

中國大陸的史學界有民國史熱，他們的民國史為什麼會熱起來？很簡單，因為第一個，中國共產黨史沒辦法研究，禁忌很多，資料完全沒有開放，跟國民黨不一樣，國民黨的檔案都開放了，他們完全不開放。要真正能夠客觀去研究近現代史，大概就是研究民國史，所以有民國史熱。第二，中國共產黨雖然在大陸把中華民國政府打敗了，但是大陸的年輕一代對他們國家的政治現狀非常不滿意，

他們還懷念民國這一段。民國雖然比較弱、比較亂，但比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自由多了，而且民國出現不少學術大師，中國大陸好像出現不了。所以他們對民國史非常有興趣，年輕人投入民國史研究的人非常多，很多人寫的東西非常出色。

臺灣史學界現在的危機是，對大的歷史問題無法與大陸學者或外國學者對話，大陸學者開會，請來請去都是請我們這邊的中老年學者，因為他們開的會大都是討論歷史大問題的，但臺灣的年輕人很少做這方面的研究。目前六十歲左右的「中生代」幾乎都快退休了，做民國史有成就的大部都是政大畢業的，因為政大歷史研究所從來就是以研究民國史為中心的。我在政大教過十幾年書，現在這些中壯代有許多是我的學生，我希望我學生的學生還能把民國史的研究撐下來。

臺師大在培養師資以外加強研究面向

我覺得師大很可惜，師大在某年被教育部判定為一個訓練師資的大學，不是一個研究性質的大學，這樣就不能翻身了嗎？現在還是這樣嗎？你們讀研究所了，應該鼓勵學校去爭取。師大既然有博士班，當然是做研究；做研究才會爭取到研究經費。

基本上，大學的聲望建基在四方面：第一，有非常有名的教授；第二，有很好的研究設備；第三，有很好的研究成績發表；第四畢業生在研究上有很好的研究表現或在各行各業出人頭地。很多大學的排名，除了設備、師資以外，就是在國際期刊上發表的學術論文。大學的水準高低，有一個國際標準，自己要能夠想辦法表現自己。我們師大歷史系，不曉得現在的研究重點是什麼？與其他大學如何比？有一段時間很重視近代史的研究，以前李國祈、林明德、張朋園等先生做研究所長的時候，許多近代史研究所的同仁都在那裡教書，當時研究近代史的學生很多。這當然跟師資有關係，老師開這些課，學生只好選這些課。一個所的研究重心，除了設所目的以外，可能跟所長的領導有關。

「學者」難再尋，「專家」易武斷

現代的大學跟古代不一樣，古代是訓練學者的，現代是訓練專家的，一開始就希望學生專精一門。現在的學問太多了，不可能都有研究，所以你想出人頭地，就要在某個地方鑽進去，如果別人鑽不進去，你就出人頭地了。以前的學者主張博學，天文、地理都知道，古代的知識分子都是這樣的，現在不可能博學了，除了你所學的，別的都不太懂，現在很難有學者，基本上都是專家。

現在的史學跟古代的史學不一樣，現在的史學比較接近社會科學，甚至自然科學，你不可以有自己的情緒在裡面。古代人寫歷史都有自己的情緒，如果讀過司馬遷《史記》就了解，他有自己的情緒在裡面。現在不能有自己的情緒在裡面，一定要非常客觀。此外，古代人寫歷史是通古今的，談到一件事，很快會想到古代什麼事，現在年輕人都不管了。研究明清史的人，就說「我發現這個是中國以前沒有的」，實際上早就有了；又譬如研究臺灣史的人說，這是臺灣所獨有的，實際上是從外面來的。學歷史如果不擴大對歷史的了解，就比較容易武斷，因為

對其他的範圍不太清楚。

臺灣歷史教育最大問題：政治操縱

這些年來歷史教育最大的問題，就是歷史完全被政治操縱。民國元年蔡元培先生做教育總長的時候，他就倡導教育獨立，第一，教會不可以干涉，因為西方的教會曾對教育嚴重干涉，哥白尼（Nicolaus Copernicus）發現太陽系，教會不准講，因為宇宙都是上帝造的，不可以隨便說別的。第二，政治、政黨不可以干涉教育，因為中國的教育幾千年來都受政治的干涉。

中華民國成立了一百年了，到現在教育還不獨立。臺灣是一個非常自由民主的社會了，但政黨就是要控制教育，所以這些年來教科書的爭論很大。前兩年歷史科的課綱爭論不下，教育部讓我去當評審委員，看看這兩派到底怎麼樣處理。我那時候還不知道爭論得這麼多，我去主持這個討論，才發現他們完全沒有交集；基本上是兩個國家的爭論，不是兩個政黨的爭論。

前一段時間我在國史館做講演臺灣民主政治的發展，我說民主政治在臺灣發展得不錯，但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，兩黨輪替在國家建設方向上有延續性，若兩個不同的國家輪流治理臺灣，這是很麻煩的。

歷史學家首重獨立精神

歷史學家最重要的精神就是獨立的精神，不受政治、宗教操縱，跟教育獨立是一樣的，不受任何黨派左右，能夠有自己的獨立判斷，這一個精神是最重要的。但是很可惜的，現在有一些歷史學者被政黨利用，自己甘願被政黨利用；他們本身就對政治比較有興趣，只是拿歷史來做工具。臺灣這些年國力逐漸衰退、年輕人找不到好的出路，不是偶然的。

擺脫政治、團隊合作

我對歷史學界最大的期望，第一個是能夠擺脫政治的糾葛，獨立做歷史研究。第二個就是能夠有點團隊精神，大家應該一起合作做一些研究，不要單打獨鬥。單打獨鬥當然是一個方式，但集中人力做一個大型的研究，比較能在學術界引起注意。譬如早年近史所做區域現代化的研究，那個研究計畫國際都知名，世界上還沒有這麼一個做區域現代化的大計劃。現在大家閉著門自己做一些小題目，有時候寫的文章也不錯，但是人家不一定看到你。

學術界也是市場經濟

歷史是非常殘酷的，不管你喜不喜歡中國大陸，在中國歷史的研究上都應跟他掛在一起。因為臺灣太小了，在外面不容易被看不見，有時候你可以透過跟他們的學術聯繫，走到世界上去。

現在是市場經濟，學術界也一樣。我本來沒有這個觀念，六〇年代末到美國去的時候，有很多學會的活動和學術會議，我自己的研究還很少，但我同學就拉

著我去，我說：「我不要去！許多學者都是洋人，我不認得，我做自己的研究就好了。」

他們說：「你不去，不參加這些活動，誰會知道你？」他們就提到市場經濟的觀念，說這些會議有機會統統要去。當然自己也要做研究，沒有研究是不行的，有研究就找機會去發表。美國有一個普通大學的歷史學博士，自己滿用功的，寫了一些論文，常常去參加學術會議，他的成就被人家發現了，就被哈佛大學（Harvard University）請去教書。你假如整天關在家裡，誰知道你？但假如自己沒有任何的學術研究成績，你去跑也沒有用。

給後輩學者的建議與勉勵

大家既然都考上研究所了，自然願意投入歷史研究。大學期間一般的學科訓練基礎差不多了，進到研究所之後就要選定一個自己喜歡的題目、自己喜歡的研究範圍去開拓它。選一個題目去做，做出來之後再從這個題目向外發展；你自己的學術領域是從一個核心去向外擴展，不能打游擊。你一定要在一個領域上，打下基礎之後，再從這個基礎向外發展研究課題，這樣你就慢慢成為這個題目當中的權威。找一個研究範圍，把時間投進去。現在找材料應該比較容易了，網路也那麼方便了，資料也那麼開放。我聽說有很多年輕的學者，他們的電腦就有好幾個硬碟，很多資料都拷貝在硬碟裡。有一位中年的朋友告訴我說：「我這些硬碟，用好幾輩子都用不完！」做研究就是看誰對這個課題下的功夫多，不要見異思遷。

我有一位同事，幾乎跟我同時來近史所工作，臺大高材生，他大概每幾個月就要換一個題目，題目做著做著，看看寫不出來就不做了，常常換。一直換到退休，他也沒寫出令他滿意的文章來。見異思遷是不行的。

我不是跟別的老師搶學生，我也不教書了，但我覺得民國史研究空間還是蠻大的，因為現在所有檔案都開放了。很可惜的，去看的大都是外國學者、大陸學者，臺灣的學生或學者，自己有材料自己不看。

歷史是專門的學問，當然還得有自己的關懷，你要解決什麼問題？你希望這個問題能夠給讀者一些什麼樣的訊息？研究歷史不是自己的娛樂，自己覺得很好玩就去研究，研究了十年、二十年，也許自己很有興趣，對別人有什麼意義？總之，要研究歷史，第一個就是時間的投入，第二個就是對歷史的關懷，第三個是多做學術交流。

柳暗花明又一村：歷史如是，研究如是，人生亦如是

我有一些朋友，特別是退休的朋友，退休之後常常非常焦慮。很多老年人容易焦慮，覺得這個社會怎麼辦啊！年輕人不敢生孩子，剛畢業做事就嫌薪水少，不肯突破困難、努力向上。我就勸他們不要焦慮，我說：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辦法，你不要為下一代焦慮，你把自己管好就可以了。」歷史上常常可以看得出來，走一走好像沒有路了，常常柳暗花明，又一條路出來。像我們民國三十八年從大陸到臺灣來的時候，真是覺得要跳海了，沒有地方好走了！共產黨大家都怕，怕

得不得了。憑臺灣這一點地方，蔣介石那一點武力，能守住臺灣嗎？真的守不住。突然韓戰爆發了，韓戰一爆發，美國就來了，後來一部分靠美國，一部分靠全民的努力，安安穩穩地生活在到現在。

一個人對人生的了解，就是從不同訊息去了解的。現實社會中，你可以了解一些東西，而現實社會很多東西都是從歷史上慢慢演變過來的。所以你讀到的歷史愈多，你對各種社會的接觸愈多，對人生的體驗也就愈多。